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下）

项 飙 康 岚

[摘 要] 项飙访谈下篇从当下年轻人的精神文化现象和社群结构特点切入，具体地分析年轻人在现实中所遭遇的问题，以及“附近”可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项飙认为，二次元文化的强大是年轻人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如何真正走向三次元的生活对今天的年轻人是一个重大挑战，社会科学需要发展出一套话语，来培养年轻人直面现实的意识，使他们从现实的矛盾和“不舒服”中看到意义和价值，而“附近”所强调的生态性视角可能成为调动这种意识的力量。项飙强调，沉溺于虚拟世界的原子化生存方式强化了社会同化的趋势，使自我变得虚幻和脆弱。近年来，“心理健康热”的流行恰恰反映了年轻人对自身困境强烈的问题意识，“附近”概念引起大众兴趣正是个体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追问和反思。同时，代际关系和性别关系在“附近”建设中，既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也是一种压迫性力量。

[关键词] 青年精神状况；二次元；原子化；心理健康；代际话语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 (2023) 06-0001-00



项飙，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作为人类学家，项飙早年因浙江村的调研而成名，其后赴海外求学并在澳洲、东南亚等地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他长期致力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劳动力市场、跨国再生产等领域的研究，通过移民的视角，他的研究涉及广泛的政治经济学议题，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劳动、社会再生产和流动性治理等。他的著作 *Global “Body Shopping”* 获得 2008 年 Anthony Leeds 奖，论文 *Predatory Princes and Princely Peddlers* 获得 2012 年 William L. Holland 奖，2000 年出版的中文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2005 年英文版）于 2018 年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当代经典重印。他的中文作品《把自己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等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而持续的反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日语、法语、韩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康岚，《当代青年研究》编委，责任编辑。

七、二次元的强大是因为线下的困难太多，如何走向三次元的生活是一个重大挑战

康岚：前面我们讨论较多的是“附近”的实践价值，但是现在年轻人都很重视精神和情绪价值。您在谈论“附近”时，专门提到“附近”有时候会让人“不舒服”，因为要处理跟不同人的关系。我感觉，这种“不舒服”跟现在年轻人的追求是正好相反的。今天的年轻人虽然有很现实的一面，但也很看重一种舒适的感觉和精神上的契合性，如果让他不舒服了，他可能会逃离，就像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现在的一些青年精神文化现象，比如网游动漫、国风文化、网红文化、盲盒文化、打卡文化等，都是非常梦幻性的、感受性的、情感性的，年轻人对这些东西的追求，往往是通过网络而不是自己生活的“附近”，他们会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分得很开。那么，“附近”到底能不能为年轻人提供精神价值？

项飙：“附近”的精神价值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附近”的精神价值高于它的实践价值。你讲青年的精神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叫作二次元现象，是虚拟的、非常象征化的。现在的科技发展，象征已经不仅仅是符号，它可以直接去体验，因为它可以动起来，带着丰富的色彩和声音，对神经形成直接刺激，给人的感觉是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里有两个情况：第一是时间性，我们要看到这种二次元现象跟一定的年龄段有关。我得到大三、面临大学毕业的时候，会有一个转折，当他走向社会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可以通过这个来满足日常的精神需要。第二是回到线下的问题，特别是在他即将大学毕业，面临找工作、考研、考公等问题时。现在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我觉得不是二次元世界有多么丰富，能给他们多少满足，而是年轻人不知道如何走向三次元的线下生活，所以使劲地躲在二次元里，在三次元里活几个小时，然后跳回到二次元里活几个小时，有时候把三次元当作二次元来活。

在一定的年龄段，年轻人的线下和线上世界是分得很开的，而且他是完全知道自己在把它们分开的，有时候是刻意地分开。这个分开对他本身的自我认知、对他的生活认知、对他的情感世界，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在这里可能会有一种错落感，一种无力感，因为生活好像是一直在不断地切换，而永远不能直接面对。因为他没办法理解对他物质生活有直接影响的那些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顺着走、不管了，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比方说中学的时候，让我考试就考试吧，我也不问考试有什么道理，问了也没用，然后一有时间就把自己全身心地泡到电玩里面去。

现在二次元文化变得那么强大，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逃避，因为现实中困难太多。现在一些年轻白领下班后是从来不做饭的，都是叫外卖什么的，直接玩电子游戏，玩到11点睡觉。我们可以说，他的精神生活通过电玩得到了满足，但是他会直接告诉你，他是不开心的，他去玩电玩就是觉得日常生活的压力太大，这样的日子过上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

八、从“附近”的“不舒服”中看到有意思的地方

康岚：现在有一些数字娱乐，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替代了现实中的某些亲密关系的功能，比如虚拟男友/女友，“云撸猫”等。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完全虚拟的形式，它满足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但其实这反映了现实不能满足年轻人精神上的需求。还有我们一直在说的年轻人集“社牛”与“社恐”于一身，在线上跟不认识的人话很多、能坦露最真实的自己，在线下却非常沉默，跟家人都没什么话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现实感这么弱，在现实中找不到他们精神的落脚点？到底是年轻人出了问题，还是现实出了问题？

项飙：这个当然不能怪年轻人，他们作为新的一批人进入现在的生活场景里面，这个生活场景不是他们造的，是老一辈留下的，所以不能怪他们。但是改变还是要靠他们，为他们自己的更好的生活！如果有人说，这种虚拟性的存在已经满足了我的一切需要，所以我不需要线下的互动，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

这个现象也不是新的，像日本的宅男和社会自闭症，就不是一个生理性、神经性的自闭症，而是选择性的自闭症。这（指自愿性自闭）对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来讲，真的是一个挑战。如果社会科学研究是不做判断地去描述，那么只能是记录了这些年轻人怎么选择，说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要有明确的结论和建议，直接告诉年轻人自闭不好，也没有实际的效果。很多人知道这样不好，但是在很具体的场景下，他们觉得这是最自然的选择。我觉得，社会科学需要发展出一套话语，把年轻人的现实感丰富起来，发展出前面提到的生态性的视角，从现实中的“不舒服”当中看到有趣。“舒服”不一定是有趣，舒服其实很容易是无聊，因为舒服的东西只让你一味放松，不刺激你，不动调你，是没有什么回味的。但是“不舒服”还是不舒服，它不会自动变得有趣，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能力来做这个转换。你说的“现实感”可能真的就是这个转换能力，把日常看似无意义的琐碎转换成有意义的叙述。一个人看到某个“不舒服”，可以开始好奇：为什么我感到不舒服，为什么那个人觉得很自然，是什么力量把自然变成奇怪，把奇怪变得看起来无可厚非？这不是很有趣吗？

一味追求舒服，就是没有现实感了。比如说现在一些年轻人要求网络小说要写得所谓“双纯”，就是要求里面的男女完全没有谈过恋爱、不能够有过性经历等，要非常纯洁的。这样去理解爱，那根本就不是爱。人作为人，去理解情感和精神上的东西，其实正是要去理解人本身的复杂性，从中看出微妙。纯洁这个东西是人想象出来的，而生活的过程本身就是不纯洁的。所以，人要在不纯洁的实践当中，看到毅力，看见智慧，看见人的德性，看见人对人的关怀是怎样的。在一个很复杂的情况下，在难以决定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关心别人，这是有趣的东西。纯粹这种观念，其实是现代性本身（派生）出来的东西，因为生活变得非常复杂，没有一个稳定的叙事，大家感到迷茫，迷茫之后就需要去想象这种纯粹。比方说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很重要的一个现代文艺思潮，有很解放的一面，但是浪漫主义对欧洲的极权政治也有影响，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也与它有关系，因为它有那种对所谓纯粹、崇高的追求，这种脱离现实的对崇高的追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所以，“附近”代表了我所谓乡绅学者（笑）的态度，觉得让“附近”进来，不要靠这种纯粹的、浪漫的东西来获得精神的满足，让精神的满足来自对现实微妙的、细微的观察。

这是可以发展出一种美学品味的。比方说让你和我去读小说，我们肯定会觉得那些所谓“双纯”的小说是什么可读的，都是讲一些甜言蜜语、美轮美奂的东西，可能第一次看会有点吃糖的感觉，但看第二本肯定就不愿意了；我们要看的还是那种让你不愉悦但是能让你信服的东西，鲁迅就是最好的例子。像鲁迅这样高度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写的东西90%以上都是让你很不舒服的，但是中国人对他的爱和感激，那是很深的，这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是鲁迅的作品带给你的精神满足性强，还是那些高度形式化的东西（比如小孩子穿上汉服、坐在台上背三字经）带给你的精神满足性强，这个大家一看都明白。鲁迅的作品是把你调动起来，让你去思考、去睁大眼睛看矛盾，让你变成一个思考的主体，他刺激你、不让你安心。虽然你还是不能控制世界，但是你至少感到，我作为一个主体在世界上存在了。

九、原子化生存强化了社会同化的趋势，使自我的主体性变得虚幻

康岚：接下来我想谈谈原子化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有一种脆弱的原子化现象，尤其是一些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年轻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沉醉在自我世界的问题。我想问，数字技术在塑造个体的心理、个体和社群的关系上，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以及随之会在思想文化上、社群结构上带来一种怎样的蜕变？现在看到的很多现象其实是有一些个体的异化或者脆弱的个体化问题的。另外，技术的这种影响应该是全球共通的，国外也是这样的吗？还是说这是现在中国年轻人比较特有的现象？

项飙：我觉得国外肯定也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在日本确实是这样。因为数字化技术提供了一个无接触社会的可能性，可以不用出门就买到东西，这使原子化生存成为可能，这当然是有很大影响的。这里我可以讲三点吧。

第一，虽然数字化是形成原子化生存的重要的物质条件，但现在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这种原子化现象，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数字化技术本身造成的，我是有点存疑的。我总觉得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没有给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吸引力和他们可以参与的地方，所以他们把数字化当作一种逃避。我举个例子，在大学里吃中饭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外卖员排队送餐，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大学食堂就在你楼下，怎么会需要去叫外卖？学生给我很多理由，比如外卖更好吃、外卖比较便宜（因为平台有补贴）等，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觉得下楼见人要打招呼太累。这跟我们过去到食堂吃饭的感觉很不一样，过去我们去食堂吃饭不仅是要吃东西，也是觉得在打饭的路上可以跟同学一起聊天啊。但现在的大学生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负担，也不知道聊什么，见了人很紧张；本来见了人就要逃，现在有了数字化技术，他当然是要用它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这个技术之所以能满足你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因为有人可以从中赚钱了，你买的东西送到你手上，是有人开着摩的跑来跑去，在高度紧张甚至危险的情况下把东西送过来，而这些你通通都不用管。数字化的真正奇妙是它为你屏蔽了你跟生活的很多真实联系，使你对生活的真实联系无知无感、不感兴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你推向了数字化生存。这里面有资本的运作，创造出很多花招把人们引向数字化生存。所以，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技术过程，或者说这首先不是一个技术过程，而是一个社会过程。

第二，刚才你讲得很好，这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年轻人觉得自我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沉溺于自我；另一方面，自我又是非常脆弱的。怎么去解释这种脆弱的自我中心？

我觉得，我们要反对自我沉溺，并不是要去消灭自我，但是就像前面你讲到的，最重要的并不是自我，而是自我和别人的连结。不是要你去消灭自我，其实是相反的：你需要对自我有丰富的认识，说话有底气、落落大方，面临事情，你至少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去思考、怎么把它分解，该跟人商量就跟人商量，不该跟人商量的时候自己也能够把事情理出头绪来，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然后做出一个选择，选择之后如果事情办不通怎么办，办不通也不会后悔，因为自己已经做了全面的思考，等等。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自我啊！就是你知道自己是作为一个主体活在世界上的，这种感觉是不可能靠一个封闭的自我来实现的。这些一定要通过对周边的观察、反思、分析，慢慢得出一些人生的智慧。

将自我完全沉溺于电玩里面的年轻人，确实是比较令人担心的。他在情感上可能会非常冷漠或者非常敏感，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伴随大脑里面各种化学物质的分泌程度而定，下场雨都会觉

得很烦，会有大量的化学分泌物出来，人就变成像一个化学体去应对外界的随机刺激，没有自己的主宰了。这样的自我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感受，更遑论对别人、对世界、对各种各样发生的事情的应对能力了。所以，自我沉溺式的自我到最后是消灭了一个社会性的自我。

第三，是跟第二点相关的，怎么理解自我的中心化和自我的脆弱化是一体两面的过程。一个没有“附近感”的自我、一个沉溺于虚拟世界的自我，最终会变成一个无差别的自我。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导致在青年人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小的，在娱乐方式、思考方式和人生的规划上，都有高度的一致性。高度一致性意味着大家一条心统一思想吗？不一定。现在的高度一致性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第一，没有真正集体的团结性出来，因为这种高度一致性都是在互相竞争，在同一条道路上把别人甩掉。第二，在这样的高度一致性情况下，形成的其实是一个对自我很大的不确定和恐惧，因为看上去别人都跟自己是一样的，想要不一样，需要刻意努力地做出来，比如买的房子大一点。所以在这样的高度一致性下面，人的社会性也变成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自我作为主体的存在变得比较虚无缥缈；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容易变成一种竞争与怀疑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互相欣赏和互补的劳动分工的关系。我觉得，现在沉溺于虚拟世界是强化了这种同化的趋势。

上面讲的三点，其实都是要回应你说的原子化问题，特别是在数字技术条件下，怎么样去考虑原子化的起因和后果。

十、“心理健康热”背后是对现实困境的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年轻人中的主流

康岚：国内最近几年，心理健康问题和抑郁症的风险在上升，在青少年中这个现象尤为突出。这跟原子化问题也有关系，以及新技术条件下的加速社会导致的个人的无力感。现在“抑郁”已经成了一个时髦词，好像人们不说自己抑郁都不是现代人了；上海的精神卫生中心宛平南路600号，已经成为一个网红标签，带有600号标识的产品都卖得很好。当然，这里有一点调侃的成分，但确实社会整体的抑郁风险在上升。不知道从全球看，是不是也有一个同步的上升？从世界范围看，是不是年轻人普遍都在经历一场精神危机？

项飙：从全球来看，我觉得肯定都有（这个趋势），但可能程度不太一样。当然我们这些年本来就有“心理热”，在疫情之前就有，疫情期间又变成一个全民化的问题。我们原来觉得，心理健康问题跟教育水平有关系，但现在在国内，我们看到农村的、小镇的、低教育水平的年轻人，他们的精神健康问题也变得非常突出。我现在好像还没有注意到，世界上有其他哪一个大国或者大型社会像中国这样，对精神健康问题有这么强烈的意识，比方你说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现在变成一个流行符号。对我来说，这种意识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不避讳了。原来觉得，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好像有一种病耻感，现在年轻人完全没有这种概念了，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大家会这样广泛地讨论自己的心理问题总的来讲是一件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强的问题意识在里头，大家觉得生活里面有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但究竟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怎么去解决？当然大家没有方案。但是大家觉得，我们现在需要讨论、需要去反思、需要去探索。我觉得，这种问题意识在年轻人当中其实是主流，大家觉得按现在的方式继续往前走，解决不了问题。

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家对像“附近”这样的概念有兴趣。大家有兴趣，真的不是知识上的好奇，他真的是从生存的角度对这个概念产生了兴趣。这里的“生存”不是说要找饭吃这样的生存，是生存感，

或者说存在感。存在感这个词可能更好，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要以什么状态存在，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什么东西让我不仅在短期觉得快乐、在长期也觉得有意义，可以一直干下去，可以平和地但是又觉得不断有干劲地干下去，可以不用去逃避，可以不断勇敢地去拥抱、去追求的存在方式。目前大家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存在感，这也是“附近”能够得到广泛讨论的一个原因。

十一、代际关系问题：“附近”的建设最重要的是“日常性”，这方面年轻人要向老一代学习

康岚：我想再谈一下代际关系的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的代际冲突非常明显，包括微观和宏观的代际关系。在家庭范围之内，年轻人觉得长辈太烦，不愿多交流。关于宏观的代际关系，比如在疫情期间，社区的组织以居委和老年人为主，这种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但同时，像小区团购这些，主要是年轻人在组织，他们做得很好，也非常体现公共性，包括一些社区公益，众筹款项给物业人员、独居老人送物资，帮小区对接第三方公益组织等；但这些似乎又有点干扰居委的主导地位，于是反过来年轻人会被教育不要添乱，这就打击了年轻人对社区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性。其实在疫情之前，很多年轻人跟社区和居委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居委就是执行上面的命令。社区是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如果以社区这个生态为例，可以看到是有权力关系的，目前基本上是老年人和行政力量在主导，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这种权力关系是否会驱逐年轻人对“附近”的参与？

项飙：在中国，代际关系对于“附近”的建设非常重要，可以从正反两方面讲。

一方面，老年人，现在已经退休的六七十岁以上的人，他们是唯一对“附近感”有直接生活记忆的一批人，他们在“附近”建设过程中是一块宝藏。在小区里面跟人有一搭、没一搭聊天的，肯定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能够有这种“厚脸皮”、有兴趣、有技巧、知道怎么在买菜的时候跟人聊天、知道别人家里都是干什么的，都是老年人。还有一些活动，比方说广场舞等，也是很重要的“附近”建设，跳广场舞时他们把孙子孙女带过来，也给很多孩子创造了一定的空间。现在的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附近”的，学龄儿童对“附近”的一点点认识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获得的。这些老人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候的中国跟东欧、苏联这样的大企业社会主义不太一样，中国的单位大院其实有很强的农村性质，孩子在大院里到处乱跑，今天在这家吃饭，明天在那家睡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很多来住厂区宿舍的员工父母都是农村过来的，大家日常都按农村或者半农村的习惯混在一起，这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不太存在。在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的街区分化很严重，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既高度密集且大家的社会背景又多元的带有农村色彩的单位大院。老年人有这样的记忆，他们成为居委会的骨干和领导也是有道理的。年轻人在突发事件之下，用理性的办法、用现代的方式组织起来处理问题，可能会做得更好，比方说像团购。但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还是要像老年人虚心学习，因为“附近”的建设最重要的是一个“日常性”，它不仅是做一个项目，更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个东西转化为一种日常，它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像团购，各种情况都有，有做得非常好的，也有半路解散的，让我惊讶的是后者，因为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大家已经到了买基本生存物资自救这样的极端情况下，怎么还会出现内部的纷争和指责。我在这里得出一个假设性的想法是，我们在基层日常中建设民主的能力真的是太缺乏了，这跟“附近”是有关的。人和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摆平，或者先不下结论，想着把事情先往下做。有人挑头，但要有人主动出来分工、分担、分享，这些都是常识性的智慧，没有很大的道理可言，但生活智慧其实是影响我们个人生活最

重要的东西。团购很快就消失了，有其他原因，但也说明它确实是针对特定目的的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日常性的存在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老人家的那种精神和态度，还是值得学习的。老人家对生活的感知是更加丰富的，他不会有那么多抱怨，就像前面我们讨论的抱怨和维护，他们在抱怨和维护的两极都比较不那么极端。

另一方面，老一代也可能给“附近”建设造成困难。在现在比较正式的话语里面，基本上是用“50后”“60后”的那一套符号来控制对生活、对社会的叙述。这个好像现在谈得不多，但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年轻人觉得压抑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感知跟目前主流对生活的叙述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他们在讲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只能自己造梗，比如孔乙己、打工人、小镇做题家、废物等，现在造的梗越来越多，都是自嘲性的，看起来都是负能量的。而那些正能量的话语都是“50后”“60后”他们青春时期提出来的东西，比如有国才有家、要牺牲、要顾大局，等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话语是跟当时青年人的生活经验有关系的，当时人们对这些表述感动是有经验基础的，但是在今天，这些话语所指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这些东西跟今天年轻人的日常焦虑是什么关系？这个目前不清楚。然后，年轻人自己也没有一套话语可以在主流媒体上系统地去讲述整个社会应该怎么样前进等。现在我们没有一个接地气的（比方一个理想生活和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说法；一讲到理想，还是说要继续繁荣、要国富民强、要在国际上拿得出去，没有在个人体验和心灵感受的意义上能让人满足的说法出来。为什么年轻人处处感到“爹味”，为什么回家觉得压抑，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也不能说老一代掌握了话语权，但是主流的话语用的是老一代的那套符号，用的是老一代年轻时候的形象，所以老一代讲起来就很兴奋，一下子回到青春了，但是这些符号究竟和老一代当年的、后来的、现在的现实考虑有什么关系，好多老一代的人可能也是不去多想的。比如老一代可能就不会讲“附近”，只会讲“万众一心”“团结”“听集体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附近”很琐碎，没什么意义，但是他们当时之所以有“团结”的感觉和那股气势，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附近”是有关系的。可惜主流话语把生活经历抽象成宏大的象征，让有些人觉得毋庸置疑地拥护，让下一代人摸不着头脑、也不知道怎么去修正和发展这些想法。

简而言之，老一代人的生活经验是财富，但是他们所熟悉的那套话语现在有一点被僵化成说教，这让年轻人感到很压抑。但我觉得，主动权还是在年轻人手里，要改变，年轻人要主动去学习老一代的生活经验；同时对那套话语不要太在意，然后慢慢自己发展出一些说法。所以造梗也是一个做法，是一个开始。先有一定的空间，然后再慢慢地有一些更加正能量、能给人指明方向同时又能够触及个体心灵的一些话语出来。

十二、性别关系问题：女性的友情比较持久，有很强的互相支持在里头，这就是一种“附近”

康岚：讲到让年轻人感到压抑的关系，代际关系是一个，性别关系也是一个，两者对年轻人参与“附近”，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现在的性别关系确实有张力，尤其是女性在这个关系中的感受可能不是特别好。另一方面，这两年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对婚育率下降的担忧，这个在近两年的公共讨论和社会情绪方面，我觉得有一点好心办坏事的味道。其实年轻人吧，可能也就是晚婚或者暂时不想谈恋爱，但现在整个社会舆论给年轻人一个很大的压迫感，比如“保卫家庭”这些话语，让年轻人更加恐婚恐育，张力特别大。我觉得，婚育本身是构成年轻人“附近”非常关键的生命事件，无论

是处理恋爱关系、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都是现实感和日常性特别强、特别需要生活智慧的事情。对于中国的性别关系以及目前在年轻人婚育事情上的舆论张力，您怎么看？

项飙：亲密关系和附近关系是需要澄清的一对概念。我提出“附近”，是有一点跟家庭相对的意思的。在中国社会，资源怎么分配和组织、人生怎么规划，其实现在家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现在的很多不平等是通过家庭传递的，比如啃老等，家庭内部的压迫感与这个有关系。现在不是说老人变得更加传统保守，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年轻人越来越依赖于家庭、不得不依赖于家庭。

像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是小城市出来的人，家里的老人肯定更加保守啊，但是年轻人也无非是过年的时候稍微装聋作哑听一听，但自己反正经济独立，老人家遗憾归遗憾，哎呀怎么还不抱孙子呢，但慢慢也接受了。但现在年轻人要靠老一代的资源再分配，既然你没闯出自己的一条路，老年人也是出于他们的关心和教育，那“爹味”“妈味”就都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家庭的重新中心化；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我作为一个搞社会学研究的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个变化。“附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关在家庭里面，你要多看看周边；同时，老一代也不要把自己所有的生活意义都放在家庭上面，孩子什么时候成婚、什么时候有第三代等，老一代也要更多走出家庭，让自己生活意义的来源更加多样一些。

第二点，你说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在寻偶、在爱情的意义上，“附近”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支点。过去，人们一般都是在“附近”找到了恋爱的人，都是原来跟你生活就有交集的人，这样才认识，认识以后通过一定的实际的接触才会产生感情。最典型的比如同学、工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父母的朋友的孩子等，所以亲密关系和附近关系是有一个逻辑连贯的，是从附近关系的一部分转化为一个亲密关系。这样的转换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多夫妻会有共同的朋友，有时候两三对之间都是多方位交织的朋友关系，“附近”和亲密关系是交织在一块的。

现在因为有了寻友这样的 App，对这个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我也观察到，寻友 App 会倒过来让亲密关系成为某一种“附近”建设的源泉，它会把不同的朋友带到一块。即使靠 App，一般亲密关系还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可持续的亲密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在地性的，会形成一个因为亲密关系而带出来的“附近”，如果有这方面的研究或例子的话，我也很想追踪看看是怎么发生的。

第三点，关于性别上的压抑和家庭的重新中心化问题。这一点，我倒觉得它跟“附近”没有直接的关系；相反，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附近”是抵抗这种压抑的一个工具。我们知道女性对日常社会关系的兴趣和对社会关系的投入一般要比男性大得多。我给你举个例子，根据一些社会学调查，那些在海外的华人老太太、华人老头，就是到国外去帮忙带孙子的老人家，老太太对“附近”的了解要比老头好得多。因为老太太要照顾别人、照顾家里，要接孩子放学，要出去买菜，这些事情会让她跟“附近”发生关系，老头儿不太做照顾工作，所以就很容易变成一个自己待在家里的人，慢慢就成了一个老“社恐”，也不知道怎么说话，出门也不知道怎么坐车等。我想说的是，女性出于照顾和关爱会更熟悉附近，因为照顾和关爱其实是附近性很强的一种工作。想象一下，如果你家里有残疾人，你必须对“附近”非常熟悉，因为要考虑他怎么出行等；你如果要照顾一个重度残疾人，比方说经常要推车到附近散步，那么哪里可以走、哪里不可以走，哪一段路有问题、怎么想办法去解决，你会投入地去想、去推动这些事。今天的年轻女性即使不承担照顾的义务，也有各种结社行为，比如“闺蜜”现象。闺

蜜这个现象不能够把它太简单地处理，为什么女性会有闺蜜一说，很重要是因为女性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大，这个压力往往是来自各种跟性别角色有关的问题，比方婚姻生子、就业当中受到的歧视或者工作中遇到的骚扰等，所以女性对友情的需要比男性可能要更高。女性的友情比较持久，有很强的互相支持的意思在里头，这就是一种“附近”了；它不一定完全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附近”，但是它给你创造这样一种生态，让你更有坚韧性，为你提供一种支撑、一个抓手，碰到问题之后，至少有人可以跟你谈、可以一起去分析。这就是一种“附近”的生活智慧：不放弃你的立场，同时又非常务实地面对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要考虑“附近”下一步该怎么走，其实我觉得从性别政治里面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因为性别政治一方面其实原则性是蛮强的，但另外一方面，它又不允许你做简单化的处理，更不能用抽象化的方式来处理，它需要一种坚韧、持续，需要用一种务实的智慧去处理。

访谈最后：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抵抗无力感

康岚：项老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最后，如果请您对今天这个时代焦虑、迷茫、充满无力感的年轻人说几句话，您最想对他们说什么？同时，如果邀请年轻人在读了这篇访谈后，写邮件（xiang@eth.mpg.de）来告诉您一些有关他们的个人经历，您最希望年轻人来跟您交流什么？我们希望这篇访谈只是一个开始，希望它为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社科研究者和年轻人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一个契机，我们《当代青年研究》杂志也希望为未来更深入的对话提供平台。

项飙：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抵抗无力感。如果说我们在生命中有什么义务的话，不让无力感把我们击垮就是一个重要义务。存在主义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是纯粹随机的、无意义可言的。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你和这世界之间必然的和谐。人活着要有意义，这个意义是要靠自己创造的，要靠自己摸索出和世界的和谐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无力感、无意义感也可以说是生命的起点，所以不用太怕它。那么，怎么具体地摆脱无力感？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历史根源，无力感不是无缘无故地来的。今天的无力感是不是跟昨天的亢奋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如果社会给了我们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就亢奋，觉得一切都是在向上的，觉得批判都是多余的；那么社会一旦给你的反馈是负面的，你一下子就会觉得是无能为力的，觉得勇敢是矫情的。这是没有看到社会和个人处在非常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把生命过程想象成了实验室里老鼠和电击之间的那种反馈关系。此外，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下无力感的内在结构。什么叫无力感的内在结构呢？就是说，无力感不是一个单一的感受，它背后有不同的因子。前面提到的预期是一个因子，如果一个人的预期很单一，觉得我这么做一定要得到这样的结果，那就容易产生无力感。同时，无力感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受挫，而是说，你觉得你受挫的那件事是唯一有价值的事情，这件事是要决定其他一切事情的。否则的话，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还可以愤怒、反思、另辟蹊径，无力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可能。

这当然不是说无力感是个人的过错。但是如果我们要对生活、对社会负责，我们只能从我们能做的地方开始，而最能做的，就是从自己开始。也只有从自己开始，才有可能去发声、去行动，才有可能影响别人，并开始改变环境。

我当然会非常高兴和《当代青年研究》的读者继续交流。我们的研究取向（“共同的焦虑”）就是要提倡“共同的研究”，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一起思考。对我来说，和读者的互动完全不是所谓发布研究结果，而是思考和研究过程本身。我特别想听到青年朋友们告诉我，你们觉得自己人生中的哪些问题

值得讨论。人生的问题一定要结合人生的经验，一个想法是不是深刻、会不会有实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想法和具体经验的结合程度。如果大家能够从对具体经验的反思开始，从这里提出有很切实的场景感的问题，会使我们的讨论更加有效。

结 语

对于访谈的价值，项飙（2020）说过：在访谈的时候不能用学术的语言，要用直白的语言来讲已经想得比较明白的话，这对于被访者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更重要的价值是互动，通过访谈能够跟现在的年轻群体交流，看到一些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个太重要了。同时项飙注意到，今天的年轻人在面对现实的困境时渴望获得一些思考的工具，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做这样的思考工具的孵化器。项飙的愿望可以说跟我们访谈的初衷不谋而合。青年研究需要去理解今天的年轻人跟当下的时代、跟眼前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理解必须从年轻人非常具体的生存状态和个人经验出发，我们希望通过交流与互动，来促进这种理解，为青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智识上的帮助。

参考文献

项飙、吴琦，2020，《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Rebuilding the Nearby”: How can Young People Gain Strength from Reality?

An Interview with Anthropologist Xiang Biao (Part 2)

XIANG Biao KANG L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young people's common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soc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at young people encounter in reality, as well as which roles the nearby can play. Xiang Biao believes that the flourishing of the two-dimensional culture is none other than young people's escape from reality, and for today's young people how to truly come down to earth is a big challenge. Social science needs to develop a set of discourses to cultivate young people's awareness of facing reality, and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value from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scomfort” in reality.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could be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this awareness. He stressed that the youth's atomized way of being addicted to the internet world has strengthened the trend of social assimilation and is making the self unreal and fragile, while the popularity of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in recent years precisely reflects the strong awareness of young people about their own predicament, so that common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the nearby precisely reflects the individual's questioning and reflection on his own way of and the meaning of the existence in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it needs to be noted that intergenerational and gender relations are both an important resource and an oppressive force in the rebuilding of the nearby.

Key words: Mental Status of Youth; “Lives in Two Dimensions”; Atomization; Mental Health; Intergenerational Discourse

责任编辑：康 岚